



## 财政学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陈宝森

2007-11-29 13:59:10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我认为西方财政学存在几个重大缺陷。

### 1. 市场失效论说明不了公共产品的产生

(1) 市场失效论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种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人观点。认为社会上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结果就会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把这个观点加以推演，既然每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共同消费的产品既不能为个人带来利益，只好由政府通过征税的强制手段，集中一部分资源，并加以配置，用以满足公共需求。他们认为，这就是公共财政的起源。

历史事实是，只要有社会化生活就必须有公共产品。科学家早就用丰富的考古资料和调查研究证明，人类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都过着社会化的生活。马克思主义的公共产品理论出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它们包含在六项扣除的四项之中，即：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金。这些应当就是人们所说的公共产品（国家行政费和国防费应当归在一般管理费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这些扣除是任何社会维系其生存和发展都不可少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尽管在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共产品的需求和覆盖面会有很大不同。这些社会需求，有些同时也是个人需求，也使个人受益。但这种受益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比如说兴办学校和公园能使当地老百姓直接受益。而兴办济贫院、老人院和麻疯病院，当事人和家属是直接受益者，对一般人就是间接的了。然而从全局利益出发，老百姓也情愿为这些事业提供物质资源。另外，公共产品的供应说也有两类，一类是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的，比如国防、防疫系统、防灾减灾系统；另一类是私人也能提供的，如医院、学校，但要使全民都能享有这些资源，公立医院和学校仍然是主要依托。

我认为，公共产品和一般商品供求决策过程不可能也不应当相同。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一般商品的供求由个人或企业决策，公共产品供求的决策只能由关注并代表公众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公权力做出。

(2) 用市场失效论来论证公共产品和财政的公共性，其结果就必然要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财政的公共性，否认它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因为当时我们还不是市场经济，照市场失效论者的说法，就没有公共产品。这就违背了历史事实。不容否认，由于计划体制的约束以及认识的某些偏差，那时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还不够快，在社会方面的公共开支覆盖面还比较小，还有许多缺陷，但是说新中国成立后财政没有公共性这个论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3) 用市场失效论来论证公共产品和财政的公共性，其结果就必须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因为公共产品和财政的公共性是有市场后产生的，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对此人们会问，美国政府的财政真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吗？如果说是，那么为什么要不顾美国多数人的反对，消耗那么多财政资源进行长达4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的财政收入一年2.4万多亿美元，为什么却还有近4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为什么对拥有的大量财政结余不是用来巩固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要

着力为富人减税？对这些问题，市场失效论者该如何回应呢？

## 2. 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问题

我认为，我们现在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大职能的框架是可以的，我国财政还加上了监督职能。三大职能是马斯格雷夫一派在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对西方财政学的重要发展，反映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财政活动内容的重大变化。马斯格雷夫总结了实践的这种变化，丰富了西方财政学，是西方财政理论的进步。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更重要的是要人们弄清，为什么亚当·斯密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而到了罗斯福和凯恩斯时代，却把财政当成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杠杆？要回答这个问题，而又回避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就是一笔糊涂帐。如果用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就可以告诉人们，因为亚当·斯密所处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集中和两极分化的问题还不严重。可是，从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后，阶级矛盾、城乡矛盾、工农矛盾都大大激化了。终于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危如累卵。因此在美国，才出现了罗斯福新政，才有凯恩斯主义的流行，财政在资源配置职能之外的另外两大职能才有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这样，西方国家也就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财政在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节作用被大大提高了。尽管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仍然反对政府干预和宏观调节，但在实践上他们已经离不开这些工具了。在财政的基础理论中，这样进行阶级分析完全不是什么政治说教，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对财政职能的认识是发展的，是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3. 关于公共选择论

财政学中的公共选择论也是在美国走红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我认为，对布坎南的理论加以介绍是有益的，并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从极端民主的另一端，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民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尴尬。

引起布坎南愤怒的是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运用财政杠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以及70年代美国政府决策失误所导致的经济停滞膨胀局面。他说，民主政体抛弃财政谨慎的普通原理似乎是不负责任的财政最明显的原因。布坎南的主张就是设计和构建有效的对政治权力的宪法约束，办法是：在某一最终阶段或层次上，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选定”如何集体地和个人地使用其资源。总之，个人必须“决定”政府财政预算的适度规模，以及财政预算组成项目。但是，他的这种财政决策的极端民主模式的可行性，连他的研究生也不相信，所以最后他只好认输。他说：我的研究生们对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在他们的评论中，最经常出现的主题认为，作为分析基础的政治秩序的个人民主模式是不现实的。在现实中，个人本身似乎并不进行财政选择。

布坎南从他的极端个人主义观点揭了西方议会民主的短。议会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例如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是垄断大资产阶级。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必须维护垄断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作为政府，它又必须防止国家的破裂，所以对底层大众也要实行让步政策，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不能损害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在美国，通过一项对人民大众有利的立法是很困难的，而对垄断大资产阶级有利的、明显的错误政策，如过去的韩战、越战、现在打伊拉克，要纠正起来又是那么的艰难，并且要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价。据估计，在伊拉克战争中致死致残的军人的抚恤费和赡养费将高达5万亿美元之巨。这是美国财政在未来若干年不能不提供的财政资源。为垄断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错误政策买单，这样的财政能说是人民大众的财政吗？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就应当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我们的经济学和财政学，而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了？我认为，这样想是不对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马克思主义失灵，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使人类找到了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久盛不衰。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100多年中，列宁用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创新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他们的理论都是马克思没有讲过的。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

为中国找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关于计划和市场，邓小平精辟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理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开花结果。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成功，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论描述是科学的。西方理论之所以不科学，是因为他们受到狭隘阶级利益的约束，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

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础理论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的财政学，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无用论。这只是说在基础理论层面。在管理和技术层面，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成就是非常有用的，而且非学不可。因为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完善市场经济。而西方市场经济，尤其是美国的市场经济最为成熟，比如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对于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当然都要学，否则搞不好市场经济，也无法同国际接轨。即使是西方的财政管理经验也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关于西方经济学习惯用计量方法研究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关系摆正，首先是搞好定性，弄清事物的本质，然后再搞定量分析，否则就会出现偏差。总之，正如温家宝同志说的：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

财政学在理论上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介绍西方财政学在基础理论方面的观点，让读者自己去鉴别。我相信，我们的读者是有足够的鉴别力去明辨是非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所研究员）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8期）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